

悲喜交集下的
中国社会
发展报告



成败萧何

朱荣林 著

学林出版社

朱荣林
著

成败萧何

悲喜交集下的 中国社会发展报告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败萧何/朱荣林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5. 4
ISBN 7-80668-896-X

I. 成... II. 朱... III. 经济管理—通俗读物
IV. F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410 号

成败萧何

悲喜交集下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

- | | |
|------|--|
| 作 者 | 朱荣林 |
| 责任编辑 | 林震浩 |
| 封面设计 | 周剑峰 |
| 责任监制 | 应黎声 |
| 出 版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
|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
|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40×965 1/16 |
| 印 张 | 22.75 |
| 字 数 | 34 万 |
| 版 次 |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
| 印 数 | 6001—8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80668-896-X/F·70 |
| 定 价 | 30.00 元 |

序

大至宇宙天体、日月星辰，小至昆虫走兽、林木花草，无一例外地遵循着周而复始的运行规律。物极必反、福祸相依是事物演化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因而，高明的决策者在实施决策管理过程中，时刻把握着两大原则：一是世事无常的原则。在他们看来，大千世界，变幻无穷，唯居安思危，方柳暗花明，胜无骄傲之理，败无气馁之由，成功与失败互为因果。二是协调平衡的原则。世界万物本为一个有机整体，分与合是事物运动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事物相同的本质。因此，现代决策观必须建立在多样性的价值体系之上，人们寻求的是一种持续稳定发展的“满意”决策，而非“最优”决策。这是因为，世上绝对的“优”和绝对的“劣”是不存在的，其互相转化规律印证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叫做“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悲喜交集的福音。”科学技术推动了人类认知社会和自然能力的提高，使之掌握了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钥匙，开启着物质文明的新纪元。但是，人类干预自然的力量使之偏离了自身发展的规律，改变了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共存关系，进而危及了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人们在喜极悲来之际，开始求助于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及其手段。与其有着十分相似结果的是经济运行方式。当人们在责难计划经济模式效率低下的弊病不久，又开始饱尝起市场经济模式对公平社会冲击的苦果。20世纪80年代中叶神州大地告别计划经济模式的那种雀跃之情尚残留在人们脑际，而今社会对市场经济模式的抱怨之声已经甚嚣尘上。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效率，但不能解决公平，能够解决惰性，但无法解决诚信。因此，

人们再度想起了一只“有形的手”，希冀政府调整自身方位，强化公共职能，而不要简单地退出市场。曾经一度抱怨政府“管得太多、管得太死”的企业家和劳动者，开始呼唤政府该管一管市场，该管一管社会了。原因在于，市场不是万能的，它是有缺陷的，有时还会失效。“郎咸平旋风”出现的时机选择，决非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资源是市场配置的对象，更是世人争夺的目标。但资源与人们开了一个历史性的玩笑：成者系之资源，败者也系之资源。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往往缺少资源，而对资源的配置水平甚高；当今世界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往往资源丰富，而对资源的配置水平甚低。决定成败的关键在于资源的流向，资源是从配置水平低的地区流向配置水平高的地区，犹如人往高处走一样，基本上从不发达地区流向了发达地区。所以，它也印证了“成亦资源，败亦资源”一说。

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可谓“无孔不入”，以人类健康为例，成亦营养，败亦营养。当今世界上，患“富贵病”危及健康者是由于营养过度、躯体超重，而成千上万饥饿者（如非洲等地）则是营养不良、体质过衰。健康与否皆系之于营养，其关键在于摄入总量的多寡和饮食结构的差异。任何一位稍有观察能力者，均不难发现，你身边的成与败竟完全出自同一根源。

朱荣林

2004年12月28日于荣竹斋

目 录

序	1
---------	---

第一部分：经济运行篇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成亦萧何 败亦萧何	2
快与慢、冷与热	11
忧患意识应当“忧”在何处	18
怎样看待缺电	22
中国人迎来的外国资本	29
要学会为他人做嫁衣	36
核心城市资格不是自封的	42
世博会有“内部主题”吗？	49
向世博经济索取什么	52
发达国家在印制经济“名片”	57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60
子夜之后是黎明	65
房地产业利润在转移	70
珠三角经济能“泛”起来吗？	73
旅馆的主人应是谁	83

不是冤家不聚头	87
怎样选择先进制造业	91
跨国公司为何能在全球套利	97
经济学家心目中的中国大酒店	100
区域经济互动靠什么	104
牛群辞官的背后	107
亚当·斯密为服务业正名以后	110
外商投资左右我国出口商品	118
独特的资本结构使跨国公司远涉重洋	125
世界的岛屿正在做什么	133
我国的股市会走向全流通吗?	149
企业凭什么走进同一个园区	156

第二部分：社会发展篇

“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是英豪”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72
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国家”	175
民族主义在捍卫什么	178
“婴儿乃成人之父”	181
美国制度大厦的奠基人	184
权力与责任的天平	186
“审计风暴”开了人们的眼界	190
《康仑报告》与全球均势战略	194
中国“最佳的出口产品”	197
音乐厅演出与街头卖艺	200
“主动资产”的人才在哪里主动	203

拳王泰森的身价飙升 1 500 万倍	206
艾滋病究竟可怕在哪里	209
英国学者李约瑟告诉了我们什么	211
君子求淑女	214
“一衣带水”带来了什么	217

第三部分：文化艺术篇

文化艺术的永久生命力在于经典，而不在于
流行

玛雅人消失之谜	222
雷峰塔倒塌以来	226
钢琴家与“琴星”之别	229
从申报文化遗产所想到的	232
地方戏曲会失传吗？	235
金饭碗不能要饭吃	241
首都有个“金子平台”	244
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	247
三只为同伴“送终”的小狗	250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	253
运河文明与海洋文明	258
有感于大学新生的入学报到	271
《笑我贩书》的启示	281
教育不能孤军作战	284
400 万美元与 5 亿美元	290
科技立法的 6 条边界	295
百强县中的 44 席缘何而来	297

第四部分：自然环境篇

恩格斯有句不为世人经意的名言：当人们向大自然索取时，大自然的报复便将开始

气象的阴谋	302
义务送水工和天然化肥厂	306
谁在破坏古代文明？	308
第 5 纪冰川期会降临吗？	311
从人与动物关系说起	314
“人定胜天”与无为而治	318
“出家人”的精神	323
警惕你身边的环境杀手	326

第五部分：人类健康篇

“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脏”

富裕和肥胖	330
风云人物的恬静“港湾”	333
“带癌生存”之路	336
行为成瘾之谜	338
人生的苦水与甜水	341
人富裕了应当怎样消费	345

后记	348
----------	-----

参考文献	349
------------	-----

第一部分
经济运行篇

“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成亦萧何 败亦萧何

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先秦诸子争鸣，开启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大发展的先河，儒、道、墨、法四大学派堪称其杰出代表。老子、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的掌门人，谙熟宇宙自然运行之道，创立和传播朴素的辩证思想，留下了与世齐名的不朽之作。老子在《道经》中言：“有和无互相转化，难和易互相形成，长和短互相显现，高和下互相充实，音和声互相谐和，前和后互相相随——这是永恒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便是老子对立统一思想的经典表述。长期以来，人们常以初汉名臣萧何的功过为喻，揭示事业成败之间的转化关系，其丰富的哲理耐人寻味；联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无不印证“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规律特征。

一、资源与成败

自古以来，干戈戎马无不为了争夺资源；大战间隙的贸易战也是为了资源。一位专家曾经作过生动的描述：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短暂的繁荣尚处于“蜜月”时期，1929年10月29日上午10时，华尔街证交所股市开盘的锣锤敲响了震惊世界的证券史上黑色星期二的丧钟。顷刻之间，美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陷入灾难的深渊。随着股市的崩盘，大萧条笼罩整个西方世界。为步出危机，一场瓜分市场、争夺资源之战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再起。以美国为首，关税大战硝烟四起，产品征收的关税从50%升至60%，甚至是100%的重税。关税之战方兴未艾，货币之战又起萧墙。黄金禁止出口，货币竞相贬值，金本位受到挑战。“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公开对峙。所有一切的争端，其目标只有一个：保护本国资源，争夺他人资源。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的需求无限性与资源稀缺性的矛盾难解难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是关键，是生命线。

但是，事物总是存在于悖论之中。当今世界资源禀赋程度相对高

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力往往落后;而资源禀赋程度相对低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力水平往往先进。以岛国或岛域地区为例,其地貌特征决定其资源短缺且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生产力水平则往往令人刮目,如日本、新加坡、英伦诸岛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等。中国、印度、俄罗斯、非洲、南美等大陆国家,资源之丰富令人垂涎,但生产力水平总是不尽人意。其源盖出于双方对资源的态度具有差异。以中日两国为例,前者的教科书从启蒙教育开始便向学子灌输“地大物博,用之不尽”的思想,后者的教科书从启蒙教育开始就向后人宣传“珍惜资源、节约资源”的理念。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在资源配置效率和水平上下功夫,甚至出现“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扭曲现象。因此,资源的粗放型配置已成这些国家的常态。日本则是以珍惜资源而著称于世的国家,原因在于资源贫乏。这个国家的企业以节约资源、降低成本为其生命线,节约资源与降低成本互为因果,其根本手段是优化资源配置水平,提高资源生产率。为此,日本的大型企业几乎都设有“成本下降顾问公司”的机构。由于国策各异,中日两国的资源禀赋程度与生产力水平形成反比的态势。据一份 1953—1985 年的统计表明,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 9.6 倍,而能源消耗却增长了 14 倍。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时,我国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总水平与日本相当,但 GNP 却只及日本的 1/6,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 5%。2003 年是我投资快速扩张的年月,钢材消耗量占全球约 1/4,水泥消耗量约占全球的 1/5,煤炭消耗量约占全球的 1/3,但我国创造的 GDP 只占全球的 1/30。

中国有“自古将相出寒门”之说,意指纨绔子弟不成才;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源贫国出理财高手,资源富国出败家之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 1994》揭示了我国资源浪费严重的情形:目前中国每取得 100 美元 GDP,消耗的能源相当于 187 千克石油,而日本为 13 千克,约为中国的 1/14;德为 18 千克,约为中国的 1/10;美国为 35 千克,约为中国的 1/5。即使是发展中国家消耗水平也比中国低。当前我国 12 种主要原材料工业品的平均物耗是发达国家的 5—10 倍,有的甚至高达 100 倍以上。与此同时,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普遍较低,如煤炭的回收率仅为 23%,铁矿为 45.4%,10 种有色金属矿分别为 23—70% (卢世琛等 2000)。

资源禀赋条件与生产力水平倒置的规律性特征,在我国国内各省市的表现几乎是世界各国的全息缩影。我国资源禀赋程度的地区分布,大体上呈东南部向西北部递增之势,而生产力水平高低,则呈西北部向东南部递增之势。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资源存量水平往往与经济发达水平成反比,其源盖出于“有”与“无”的互相转化,“有资源”者可以通过低效率转化为“无资源”,“无资源”者可以通过高效率转为“有资源”。

二、经济全球化与成败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主旋律,其本质是资源配置全球化。在此,暂且不论全球化的道德背景,只从其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全球化带来的效益主要是效率性收益,因此成败的关键是各国配置资源的水平和效率。凡是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国家和地区,资源净流入,效率性收益大,其成功归之于全球化;凡是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国家和地区,资源净流出,效率性收益就少,其失败亦归之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目标是保证资源在全球范围无障碍地流动,其过程管理是 WTO 规定的三大任务,即放开市场、制定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换言之, WTO 只是解决了资源的无障碍流动,却无法规定其流向。资源的流向,是由配置效率低的地区流向配置效率高的地区,而不是相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有利于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发挥的,则配置效率就高;制度安排有利于强化政府审批制度的,则配置效率就低。因此,对于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与其心急火燎地争取“入世”,还不如加快制度创新的进度。否则,“入世”之后的经济成败实难预料。南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入世”之后生产力发生倒退,便是教训。这是经济全球化利弊相间的第一个因素。

因素之二是国际贸易大家庭的发言权并非由成员单位平分秋色,而是全凭发达国家掌控。以 WTO 的前身关贸总协定为例,风云历程近半个世纪,拥有 123 个缔约方,占有全球贸易额的 90% 以上,可谓“大家庭”了。但由于经济强弱严重不对称,会上只见发达国家唇枪舌剑,高谈阔论,少见发展中国家张口发言。因此,有人讥之为“富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由美、欧、日少数“庄家”控制,关贸协定历次谈判会议的进程和结果,几乎全由美国国内法律和政策所左右。乌拉圭回合是

这个国际贸易协定走向历史转折关头的里程碑,发展中国家头一次显示其不可小视的力量。但是,谈判的主动权依然执掌于西方主要贸易大国手中。利益分配仍然绝对地向发达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收益无几。西方发达国家以“差别优惠待遇”为诱饵,迫使发展中国家以承担处于劣势地位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措施等领域的新义务为代价,换取一张张市场准入、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等方面的“空头支票”。因此,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绝不是“免费的午餐”,它以实力排定免费程度的等级座次。在对待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上,发达国家全神贯注于信息技术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自由化,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自由化则不屑一顾;对此,多边贸易体系显得无能为力,原因是,其规则的制定基本上由发达国家说了算。

经济全球化决定成败的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多极化是一对互为逆向运行的运动轨迹,前者是离心运动,后者是向心运动。全球化是一个发散的过程,是多极化的前提;多极化是一个收敛的过程,是全球化的归宿。由于多边贸易体系面对许多复杂的新局面,加之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日见其强。自20世纪90年代初叶《欧洲联盟条约》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后,全球已出现三十多个贸易集团,囊括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区域集团内外分别采取区别性的政策,对集团成员优惠有加,对外则壁垒相见,甚至实施整体报复与反倾销。从此意义上判断,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一个特定国家而言,其对外贸易的复杂程度真可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三、政府地位与成败

WTO时代的到来,各成员国正在重新评估其政府的管理职能,使其符合这个多边贸易组织的具有国际条约法性质的法律体系框架要求,再也不能各行其是了。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适度的干预,这种“度”体现在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质量之上。适度的干预是经济成功的保障,失度的干预是经济失败的根源。

首先,要注意政府干预的正确性。商品经济产生以来,对人类经济活动有过深刻影响的是三大理论,即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计划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理论。20世纪下半叶起,第三种理论普遍受到青睐。这个理论的前身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20世纪30年代

初叶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使之黯然失色，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并成为二战结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市场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理论是凯恩斯理论的进化和发展，它主张政府的干预应当有其限度，因为非理性的政府干预会使市场失去活力，导致经济“滞胀”。政府干预的“度”应当界定在确保宏观经济平衡、市场失效情况下的效率和社会分配的公正性之上。

政府干预的“度”还应体现在干预方式上，正确的干预方式必须满足三点：一是干预的前提要得当。政府的行政干预必须以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前提，这种作用体现在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的形成上。二是干预的动机必须正确。政府干预的目标是弥补市场的缺陷，促进市场机制和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此，政府必须制定各种确保市场正常运行秩序的政策、法规和制度。三是干预的手段必须多元。除动用直接干预手段的行政控制外，应当多采用间接调控性质的经济、法律手段，比如财政、货币、税收、法规等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

其次，要防止政府干预的非理性化。从实施市场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政策的效果来看，其非理性的干预时有发生，导致经济运行的不良后果已不鲜见。这里常见的情况有以下三种：

一是高度集权型的政府干预。高度集权型的政府干预多见于长期奉行计划经济理论的国家 and 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均有三大特征：① 政府地位强。由于长期计划模式运行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领导经济，因而其管理模式、管理体制、管理规模、管理理念均与市场模式相悖，其领导经济的传统手段是名目繁多的审批制度。② 调控手段以行政方式为主。由于政府强，体制决定其权力凌驾于市场之上，调控手段往往以行政干预为主，宏观政策为辅，或者两手交替使用。因此，其调控结果往往是“硬着陆”，经济波动强度日大、波动频率日高，20 世纪 90 年代初叶之前的中国便是如此。③ 调控政策缺乏分类指导。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调控政策往往实施“一刀切”，缺乏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的能力，追求轰动效应，导致调控效果发生重大偏差。如我国针对 2003 年土地管理中暴露的问题，在东西部情况反差颇大的情况下，采取统一政策进行调控，其结果必然是苦乐不均，效果偏离目标。

二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模式。亚洲几个新型工业国家和地区基本奉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模式。其政府干预强度虽然不及高度集权型的政府干预,但其政府的影响力远大于欧美市场化国家。其明显的特征有二:① 产业政策的导向力强。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对经济实施干预的主要方式,它虽然对企业不具备法律上和行政上的约束力,但其诱导力量不可小视。但是,产业政策有其明显的政府思维的痕迹,它与政府的利益偏好直接相关,具有“钦定”的性质。这种“钦定”与市场作用下的优胜劣汰法则未必完全吻合。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叶东南亚金融风波中,不少败北的产业正是日本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对象。这是深刻的教训。② 政府与企业关系过密。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包括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十分注意向权力拥有者攀附,以期达到获取先发性商机信息、提高融资能力和分散经营风险等三大目的。政府主导型市场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配置资源的权力并非全部集中在市场手中,这就必然导致政企关系的扭曲。东南亚金融风波袭击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这种关系的负面影响暴露无遗。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均曾自食其果,成为世人的教训。

三是对外依赖型的经济导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其经济振兴的过程也是外向型经济不断发育的过程。这些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容量相对都比较小,经济活动对外依赖性颇大,无论是其产业结构调整,还是经济过程的分工与合作,均属典型的“外依型”。由于过分依赖外资的注入,导致本国自主经济结构的扭曲、本币币值与外汇供求脱节、股票资产和房地产资产泡沫加大等风险。这些风险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波中均从潜在的风险转化为现实的风险,其教训十分惨痛。

再次,要重视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干预的特殊性。转型经济时期资源配置方式处于从计划模式走向市场模式的过程,随着资源配置权力的调整,利益也正在重新分配之中。在这个时期,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完全调整到位,其调整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从政府角度分析,退出权力领域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革命,其过程十分痛苦。为维护既得利益,将会使一系列规范市场的措施演变为寻租的手段,正如某些学者尖锐批评:“不规范的政府部门中某些人必然会打着‘规范’的旗帜扼杀新生的市场。”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不仅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而且由于政府并没有将规范市场作为其基本职

能加以重视,因此市场的有效性堪忧,企业进退市场的成本不低,市场的对称性不强,法制建设不能到位。从企业角度分析,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企业处于不平等生存状态,企业风险意识薄弱,适应市场的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陈旧。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干预具有下述特殊性:

① 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掌握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导致市场化的程度还不高,以致市场、企业均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这里有两层原因决定,一方面是政府没有完全退出应该由市场起作用的领域,另一方面是市场、企业至今仍然处于不完善、不规范的境地。

② 政府职能机构具有成为利益集团的趋势。政府职能部门利用手中尚余的权力去追求垄断性利益已成大势。最典型的例子是以“规范”名义去收费,不仅工商部门收(每年全国约收 300 亿人民币),交通部门收,卫生部门收,教育部门收,连公安部门也照收不误。这种收费热情源于利益机制驱动,即利益的大小与对象的不规范程度成正相关,一旦对象趋于规范,利益将自然减少。因此,这种“规范”的期望值多半是为了维持对象的不规范;

③ 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政府职能的越位导致市场作用的弱化,政府职能的缺乏则导致公共职能的弱化。由于考核指标体系的老化,日益导致政府官员为追求速度指标而献身,严重扭曲了可支配财力的支出结构,扩大了非公共财政职能性的支出,弱化了公共财政职能性的支出,进而扭曲了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为缩短转型经济的历史周期,其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但是,中国的改革又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非经济因素的边界,一条是所有制边界,另一条是稳定性边界,一旦触犯二条边界,任何改革即便对于发展经济有利也得“叫停”。

四、经济学原理与成败

经济决策是一组多目标的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涵盖着人类的全部相关关系。换言之,人类的经济决策必须建立在多样性的价值基础之上,才能导致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导致世界的稳定性、有序性和人类文明的连续性。这种多样性的价值体系至少包括下述内容:

一是人与未来的关系。人类生态学认为,价值概念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仅是当代人,也不仅仅是当代人中的某一部分,更非决策者个人。这个主体包括了所有的当代人和未来人类群体,是当代人类和未来人类的总体。但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理论旨在解决